

现代社会科学文库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与城市化

RURAL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王章辉 黄柯可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现代社会学文库·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 转移与城市化

王章辉 黄柯可 主编

王章辉 黄柯可 著
周以光 ~~萧辉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王章辉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4

(现代社会学文库)

ISBN 7-80149-125-4

I. 欧… II. 王… III.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世界 IV. F2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811 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

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主 编: 王章辉 黄柯可
著 者: 王章辉 黄柯可 周以光 萧辉英
责任编辑: 许春山
责任校对: 昆 鹏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125
字 数: 307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7-80149-125-4/C·018

定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对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面世的成果尚不多见。本书不仅论述的时间跨度大，而且涵盖面广，对两个多世纪来英法德美四国人口流动的历程、条件、各国的共性和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带来的社会问题等都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了总的历史价值，堪称这个领域的开创之作。

——程西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历史趋势。我国亦正面临着城市化的一系列问题，特别需要研究欧美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王章辉、黄柯可主编的《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恰好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并填补了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学界有关城市研究的空白。从这个角度看，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张宏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总 序

承蒙出版社之邀，为《现代社会学文库》作序，本人自觉才疏学浅，深感惶恐。

今年是戊戌变法百年纪念，也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中国早期现代化肇始的许多制度化标志都发生在百年之前的 1898 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学亦然。1895 年严复发表了《原强》，把西方的社会学思想融合为他自己的群学思想；1897 年严复把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 1873 年著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一书译成中文，冠名为《群学肄言》；1895 年前后，根据梁启超的记载，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设立了群学的课程。如果以这些事情作为社会学在中国产生的标志，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就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若以 1910 年京师大学堂（1912 年改为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化的标志，那也已经有 88 年了。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实际上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社会学导入中国的过程，与现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经导入和产生，就完全被纳入中国的文化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而作为新思想的种子，它也在改变着这一话语系统和观念系统。

社会学导入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思想或一种方法，也是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就像与其同期导入中国的学堂、船政、邮电、铁路、银行、矿务等等制度形式一样，都是早期现代化的制度符号。社会学的导入中国，使中国学者对于社会现象

的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现象分类和大一统混沌解释的方法羁绊，走上了从具体现象的归纳出发寻求背后的因果规则的实证道路。

梁启超在他 1923 年演讲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中国学术开始转向务实的思潮追溯的更远。他认为近三百年“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的时代学术思潮，是对过去六百年道学传统的反动。蒋方震更把“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概括为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清学之精神”（《清代学术概论》序）。无论走向实证的学术取向乃中国所固有还是西学之东渐，中国广泛开始按一定方法进行的社会调查，却的确是在社会学导入中国以后的气象，并非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学者那时才幡然省悟，原来在楼阁里谈论的学问，也是需要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检验的。

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结构；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它的变迁是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的，它是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行动构成的。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的、所关注的、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

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F. 布罗代尔（1902~1985）在研究 15~18 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

件的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历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的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等。

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但是，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具体和走向个别的惯性和偏好，也容易形成两个学术上的弊端：一是对理论的轻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理论上的匮乏；二是在研究中国或研究中国的某个地区、某个村落时，过分地强调其文化价值的“特殊性”，而与现代性的普遍性断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中断约30年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起飞和社会加速转型的现实，对社会学的研究形成强烈的刺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参与了很多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但在理论上有分量的建树，仍告阙如。

中国社会学要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

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无论这种理论学派是实证的抑或解释的，是结构决定论抑或理性选择论。因此，及时地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著作，特别是翻译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就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理论上的成熟和参与国际学术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目前，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很可能会使社会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对社会学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学也应密切跟踪和了解这种新的变化趋势。

学习国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要与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那些紧迫问题结合起来。社会学作为一门介入生活、改良社会的应用学科，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它的发展就是始终与对进步和秩序问题的关注密切相联的。然而，每个国家的社会学，并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具有学术上的特殊性，更不能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在学术上实行排他主义。社会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命题和不同的思潮，其研究对象可以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巨大跨度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逻辑和基本规则是相同的，使用的学术语言和学术概念是共同的。

中国社会学目前在理论上的苍白，固然与社会学在中国内地近30年的研究中断不无关系，但独坐寒窗者日少，短平快的研究日多；理论的反思少，观点的炒作多；长远的知识积累少，赶时髦的时兴之作多；欣赏别人成果者少，自以为是者多；……成就和功利目标发生如此转向，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大学里的莘莘学子，通过老师和学兄之口，一代又一代地传咏着王国维对苦涩的治学道路所给予的诗意般概括：“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可见做大学问，要具有“回头蓦见”的功夫，就非要有“独上高楼”的勇气和“终不悔”的决心才行。

但愿这套包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和国外译著两个系列的社会学文库，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走向更加成熟的见证，记录下中国社会学新一代学人努力建树理论命题和丰富学术积累的真实足迹。

李培林

1998 年初夏于北京月坛

096509

绪 论

人口流动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或从人口稠密的地方向人口稀少的地方流动，或从食物匮乏的地方向食物充裕的地方流动，或从发生天灾人祸的地方向非灾害地区流动，或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向条件较好的地方流动。除个别情况以外，人口流动能使人口与自然资源的配置趋于和谐，使地球上的人口分布趋于均衡。人口流动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变化，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

本书研究的是人口流动的一个特殊阶段，是指因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分布大变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它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过渡，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工业化以来人口流动的原因、流动方式、各国特点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欧美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的研究在 19 世纪下半叶就已开始。A. F. 韦伯早在 1899 年就发表了《19 世纪的城市发展，统计研究》一书。此书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论述了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城市发展的状况。该书的长处是资料丰富，含盖面广，便于对各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行比较。英国较早研究农村劳工流动的经典之作要数 A. 雷德福的《英格

* 在写这篇绪论时，黄柯可、周以光和萧辉英三位同志分别提供了有关美、法、德三国研究概况的素材，文中吸收了他们三人研究的成果。成稿后，黄柯可做了修改和补充，并经周、萧二位同志过目和提意见。

兰的劳工流动,1800~1850年》(1926年出版)。该书对英国农村劳工流动的原因、流动方式、国际移民等都有较详尽的叙述。但早期的研究著作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出现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研究热,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等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有关的著作和文章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由于历史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技术不断完善,原来残缺不全的统计资料得到补充,统计空白得到填补。地区的个案研究和全国性的宏观研究都取得很大进展,历史发展的轮廓越来越清晰。

一些国家成立了专门研究人口流动的机构,如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人口流动与多种文化研究所、柏林洪堡大学的人口流动研究室、马克思—普朗克协会建立的人口学与移民研究所。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是世界知名的机构,专门研究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人口流动及城市发展的问題。1951年,在美国农业部的倡导和支持下,美国各大学社会学、人口学 and 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联合起来,开始“地区人口项目”研究。在以后几十年中,美国学者按地区对美国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分布的变化及其动力、移民的影响进行专题研究,成绩斐然。

研究英、法、美、德农村人口外流的著作很多。英国著作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有J. 萨维尔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人口的减少,1851~1951年》(1957年)。这本书分量不大,但言简意赅,提供了农村人口外流的历史背景。书中对城市社会的发展、农村手工业的衰落等造成农村人口外流的因素有独到的分析。除宏观论述外,还有对个别地区的范例研究,对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等都有论述。D. 贝恩斯的《一种成熟经济的移民,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向外移民和国内移民,1861~1900年》(1985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在19世纪下半叶农村人口向城市和海外的流动及城市人口外流做了定量分析。法国让·皮梯埃的《农村人口外流和法国国内

移民》(1971年)用极其详尽的统计资料论述了法国一个半世纪的省际人口流动及其原因和后果。乔治·迪比等学者的巨著《法国农村史》(1976年)设有专章分析农村人口外流等问题。雅克·杜帕奇埃等的《法国人口史》(1988年)分析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和城市化。美国埃弗雷德·李等编著的三卷本集体著作《1870~1950年的人口再分布与美国经济增长》(1957、1960、1964年)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堪称权威之作。W. 威尔科克斯等著的《美国农业经济学》(1974年)对于1927~1970年美国农业人口的迁移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论述。D. 约翰逊和R. 坎贝尔的《美国黑人的迁移》(1981年)是专论黑人流动及其原因和后果的专著。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特别重视移民问题。D. 沃德的《城市与外来移民 19世纪美国的地理变化》(1971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70年代,美国学术界就移民问题进行集体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论著。R. 科恩主编的论文集《剑桥世界移民概论》(1995年),包含了27个国家和地区99位学者研究国际移民的成果。德国对人口流动的研究特别重视。沃尔夫冈·克尔曼是较早研究德国工业化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德国经济 and 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学者。他著有《工业化时期的人口》(1974年)。在书中,他高度评价了农村人口转移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说:“农村劳动力远距离流动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性运动”。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人口流动与多种文化研究所所长克劳斯·约·巴德教授的《从向外移民的国家变为吸收移民的国家,德国1880~1980年》(1983年),不仅研究了19世纪的劳动力市场、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对当代移民也有自己的见解。他特别重视研究农村人口转移同德国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各国研究城市化的著作十分丰富。H. S. 戴厄斯和M. 沃尔夫主编的两大册集体论著《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是城市史研究

之集大成者，它自成一体的各个部分，是论述城市生活各个侧面的专论，内容涉及城市人口的来源、城市发展、城市体制、卫生、贫困、政治、宗教和城市文化等各个方面。J. 沃尔文的《英格兰的城市生活，1776~1851年》（1984年），揭示了城市社会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对城市文化、住房、卫生状况、犯罪等问题均有论述。P. M. 霍恩伯格和L. H. 里斯的《城市化欧洲的形成，1000~1950年》（1985年）的第三部分是专论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工业化时期城市化的人文后果。法国让·弗朗索瓦·格拉维埃的《巴黎和法国荒原》（1972年）和帕拉希德·朗勃的《农村社会 and 城市化》（1974年）专门论述法国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关系。美国城市史研究以A. 施莱辛格、R. 韦德、小S. 沃纳、B. 麦凯尔维等人为代表，著述甚丰。

有不少著作和论文论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专门问题，如城市住房、卫生状况、城市文化、市政管理、移民的年龄和性别结构、移民的社会后果、城市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等，还有一些成果是对特定地区和城市的个案研究。

对城市和城市生活，历来评价不一。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在现代世界上，进步的道路是城市道路，人口的城市化是物质利益提高的标志，是我们文明的量度。可是，那些留恋贵族生活和怀念田园生活方式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特别崇尚乡村宁静的氛围，对工业时代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和城市发展持特别厌恶和否定的态度。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10年）对城市化的评价相当偏颇，他写道：“世界上的大城市都变成了令人厌恶的男女放纵和贪得无厌的中心——其罪孽之尘像所多玛（Sodom）^①的烟尘一样冲上云霄，其污染疯

① 所多玛（Sodom），源出《圣经》，意为罪恶之城，因其居民罪孽深重，上帝降火焚该城。

狂蔓延,渗透着周围农民的骨髓。”浪漫主义流派的文学家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等在其文学作品中都流露出对逝去的田园生活的怀念,对工业城市的诅咒。华兹华斯强烈谴责“放荡的城市”,称城市人沉沦于“罪恶的道路”。^①关于乡村美景和城市罪恶的言论渗透在诗歌和众多小说之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还有一定市场。欧洲大陆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也与英国同行类似。这种观念在学术界亦有反映。不少法国早期的研究者对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基本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把农村人口的流动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识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是一种正常的、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只有少量论文见诸报刊,我们见到的著作有戎殿新和司马军主编的《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1989年),该书是对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历史进程、现状和存在问题的概述。由于此书涉及面广,对个别国家的论述不可能详尽。王旭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1994年)是我国学者研究美国城市化的第一部专著,其中有不少关于人口流动的论述。

二

工业化时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及随之开始的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导致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工业革命是工业生产以机器取代手工劳动,以工

^① H. J. 戴厄斯和M. 沃尔夫主编:《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H. J. Dyos and M. Wolf, eds., *The Victorian City, Images and Realities*),第2卷,第873、876页,伦敦,1973。

厂取代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的过程和管理方式的巨大变革，它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劳动生产率，使工业生产产量迅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门类不断增多。制造业迅速发展带来了采矿业和其他原料生产部门、煤炭等动力工业、建筑业及建筑材料工业、沟通各产业及其与消费者关系的商品流通领域和其他服务业的大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让位于工业，其比重迅速下降。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牵动农业劳动力按其下降的速度和规模，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在工业化以前，手工业除一小部分分布在城市外，大量分布在农村，而且常常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工业革命中发明的动力机（先是蒸汽机，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内燃机和电动机），改变了工业生产对水力、风力等自然动力的依赖状态。工业生产使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的依存度增高，又依赖人力和资源市场、产品销售渠道、动力产业、交通运输、金融业、科技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这样，工业的配置逐渐从分散转到集中，从农村转到城市。在机器生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破产，手工业者失业。商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主要发生在集市和城镇，工业化时期的商业更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属于第三产业的公共服务部门、文教科研、医疗卫生、司法行政等等都植根于城市。

近代以来，国家行政机构迅速膨胀，行政人员队伍日益庞大。第二第三产业的集聚型布局导致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也就是向城市转移，即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一个重要后果。所谓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经济和人口分布重心向城市转移、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强化的历史过程。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第二第三产业向城市聚集的必要条件，

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没有方便、快捷、廉价的交通工具，制造业就无法摆脱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的限制。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和食品就得不到及时的供应，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受到地域的限制。

农业自身的变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废除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彻底消灭农奴制度及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消除公用地残余，确立土地私有制，是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骑士领地制的废除、法国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德国对农奴制的废除等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道路。

当竞争机制引入农业后，土地的兼并和农业的规模化就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自然出现。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的进步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商品化程度，不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以满足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另外，农业增产的粮食和其他食品可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对食品的需求。

在本书涉及的英、美、法、德四国，人口的流动基本上是自发的，但政府的政策不无影响。英国和德国在 18 和 19 世纪对定居法的修改和停止执行，德国农奴制的废除，消除了人口流动的法律障碍。英国的圈地法、美国内战时解放南方奴隶的宣言和《宅地法》以及战后解散南部联盟军队、各国行政的集权化和军队的集中等等政策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广泛实行的城市规划、贫民区的改造、郊区的住宅建设、影响产业分布的政策等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还有一些直接的诱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农民被剥夺土地、雇工被解雇、农村手工业的衰落、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暗淡前景，均构成